

雪泥鸿爪

新鲜之味

尚九华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太原印象

“骄子”游天龙山

金夷

1980年,我正在上大学。星期天是学子们读书之余难得的休息日,秋后,我们山西大学七八级中文系的十几位同学相约去天龙山游玩。别人乘坐公交车,我和太原的另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前往,在晋祠集合后,大家便开始爬山。

那时的天龙山里还没有旅游公路,景区也无任何导游标志,好在我们脚下有使不完的力气,不怕找不到景点。两三个小时后,男女同学全部登临天龙寺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天龙山分东、西两座山峰,东峰叫“仙岩山”,西峰称“大佛山”,只觉着千山万壑,宛若一条游龙。

教科书上介绍,天龙山石窟主要为人文景观,以“小而精”著称,体现出不同于其他石窟艺术的独特风格。其中佛像、胁侍诸像,雕技甚为精美。

天龙寺显得有些破败,寺东侧有钟楼,后面有禅堂院、九莲洞。寺的西侧有北汉时期建造的千佛楼,只是不知何时已毁。寺周散存10余通记事碑石,记载着寺庙的兴废。

天龙山屏峰黛立,松柏成荫。早在东魏时期高欢就开始兴建避暑行宫,北齐高洋兴建天龙寺,并开凿石窟。山因寺而得名,寺因窟而著称。天龙山石窟依山开凿,造像的雕刻技艺可分为圆雕和浮雕两大类。圆雕以贴壁圆雕为主,塑造大型佛像和菩萨像;浮雕多用于建筑构件、羽人、龛楣花纹等,造像大至数米,小仅盈寸。

从建筑年代上来说,天龙山石窟经历了东魏、北齐、隋、唐几个朝代,雕刻风格明显不同,有些雕塑还保留着斑驳的颜色。经过了上千年的风雨洗礼和烽火战乱破坏,整个石雕群不少已面目全非。尤其是20世纪初,一些精美的雕刻艺术品被盗凿并劫往国外,散布在日本和欧美各国,为国内石窟破坏最严重的一处。

天龙寺门前有一棵奇异的古松,形如华盖,盘旋的虬枝俨然为腾空而蟠卧的苍龙。松主干高度约2米,斑驳嶙峋,但枝桠极为发达,枝干四面平伸辐射、盘根错节,浓密的树冠舒展开来如同一把巨伞,冠盖面积足有两三百平方米。在此,我们似乎寻到了太原的“龙脉”。

登上天龙山一看寺庙,二看石窟。去石窟野径难行,且不少已遭到损坏。我们看不到任何景点说明,也只能是走马观花,以游览为主。

一切都在百废待兴。新一代大学生是祖国的骄子,我们同学青年,意气风发,在寺庙院内合影后,便站在天龙山巅,远望晋水长流,并州大地尽收眼底,大家情不自禁地大喊“我们来了——”



荷 潘泉 摄

朝花夕拾

古人也爱跟帖

张天野

古人虽然没有网络平台,但他们的确也有跟帖的举动。举例说明。“三言”中的《警世通言》有一篇《崔待诏生死冤家》,其入话部分出现一段宋代“网络论坛”。王荆公(王安石)作为楼主发帖认为春归去是东风送的,引起一众诗人纷纷登场辩驳。都有哪些诗人呢?苏东坡说是春雨送,秦少游(秦观)说柳絮飘走,邵尧夫(邵雍)、曾两府(曾巩)、朱希真、苏小妹则认为春归跟蝴蝶、黄莺、杜鹃、燕子有关。最后王岩叟出来和稀泥,说九十日到了,春天自己回去了。每人一首诗词,一下把话本搞成了“跟帖大会”。

可能有朋友不服气,说这只是小说家言,不足为信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正史。巧了,最早的“跟帖”就是经书和史书的注疏。像孔子编纂《春秋》,后面有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三传对其实录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也有裴松之做的《三国志注》。这种跟帖很“夸张”,居然能独立成书,有的甚至比原帖更有看头。

第二种古人跟帖多是诗人。我们读宋词,经常会发现有些词句“抄袭”前代,不过宋人管此称化用,而且化得十分光明正大。像周邦彦的《西河·金陵怀古》就化用了刘禹锡的《石头城》“山围故国周遭在”和《乌衣巷》“朱雀桥边野

草花”,而姜夔的《扬州慢·淮左名都》则接连化用杜牧的四首诗,无疑乃小杜的粉丝。

有铁粉,自然也有黑粉,跟帖的古人也不能免俗。王安石就是这样。像杜牧感叹项羽说:“江东子弟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老王就唱反调:“百战疲劳壮士哀,中原一败势难回。江东子弟今犹在,肯为君王卷土来?”司马迁冠孟尝君为战国四公子之首,老王开怼:“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。”

有朋友觉得这些算不得真正的跟帖,因为不在一个时空、一个平台上。事实上,同一个平台的跟帖也有,像古人的题壁诗。李白在黄鹤楼游览诗兴大发,抬头一看崔颢的七律,只能留下两句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,黯然下楼。著名的题壁词《钗头凤》是陆游题写在沈园墙壁,前妻唐婉看到了,也题了一阙“世情薄,人情恶,雨送黄昏花易落”,不久唐婉抑郁而终。

题壁诗在民间也很普及。明朝时,苏州楞伽寺墙壁上题满了歪诗。有人愤然写道:“多时不见诗人面,一见诗人丈二长,不是诗丈丈二长,缘何放屁在高墙?”构思已甚奇特,下面更有高手“跟帖”道:“放屁在高墙,为何墙不倒?那边也有屁,被它撑住了。”

连载



17

李骏虎 著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行筏三百艘,转运不绝。”

常家父子在下梅设庄后,创立了收购、加工、贩运一条龙方式,雇佣当地工匠上千人,将散茶加工成更加便于长途运输的红茶和砖茶。每当茶期,车马浩荡运输至河口,再雇佣船帮,走水路经信江、

鄱阳湖、长江至汉口,沿汉水运至襄樊,转唐河,北上到达河南社旗——社旗有10家专为山西茶商兼做保镖的客店,称十家店——而后转由马帮驮运到洛阳,过黄河,越太行,经长治、晋城,出祁县洪口后,换装畜力大车继续北上,经太原、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,再换骆驼穿越茫茫大漠,最终到达库伦、恰克图商城,全程七千余里。常家的骆驼队兴盛时达到上万峰,驼运线也延长到从黄河到莫斯科。因为晋商贩茶,合作伙伴邹氏成为下梅首富,巨室,下梅也成为武夷山最热闹的茶叶集散地,横贯下梅的当溪两岸店铺鳞次栉比,兴起高门大户70多座,带动了从下梅到恰克图沿线3500千米的茶叶生产、水陆运输、保镖客店甚至青楼行当的兴盛,拉动了大半个中国的经济繁荣。

常家在恰克图设庄主营武夷茶,俄商买茶后再向西横跨西伯利亚,直至遥远的莫斯科、圣彼得堡,以及西欧和中亚国家。从武夷山下梅到欧洲,这条纵贯中国南北,穿越中蒙、俄大漠草原,横跨亚欧大陆全长13000千米的国际商贸通道,被誉为“晋商万里茶道”,先后延续两个世纪之久。晋商不畏艰险、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,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史谱写了壮美篇章。晋商到武夷山贩茶,历经二百余年,常家收购了多座荒废的茶山,用晋商锲而不舍、精益求精的精神,把武夷茶的种植规模和品质都推向了一个巅峰。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”,说的是晋商乔家对西北发展的影响,而常家更是开辟了两个世纪的中欧万里茶路辉煌,树立了晋商的历史丰碑。

随笔